

陷都小學教員周廉臣的西遷之旅

岳謙厚

[提 要] 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戰區乃至臨戰區大批民眾被迫走向內遷之路。曾於丹陽、南京一帶執教多年的小學教師周廉臣,在首都淪陷之前即加入難民遷徙隊伍,並將從南京輾轉湖南湘鄉途中所見所聞及內心感受書於日記,留下珍貴的流亡實錄。途中,他既經歷露宿街頭寒風侵襲的艱難困苦,亦在友人家裡度過難得的片刻安寧。周氏以親歷者的角度記載了戰時內地社會的“常”與“變”,異鄉的短暫寧靜與故鄉淪陷的強烈反差,使其逃亡旅程充滿思鄉之情與憂國之愁,而作為教育者“執筆上陣”的身份特徵則尤為彰顯。即便在湖南湘鄉友人家中過上安穩生活,其仍不顧挽留毅然踏上前往桂林的流亡苦旅,以覓尋終身執志之教職。這不僅僅在於其日常家庭生計,亦充分地展現了其深厚的家國情懷。

[關鍵詞] 周廉臣 周廉臣日記 戰時內遷 難民

[中圖分類號] K26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207 - 10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遷都、民族工業搬遷、高等院校轉移和黎民百姓流亡相互交織,共同構成規模空前的戰時內遷運動,而由普通民眾所形成的巨大難民潮更為引人注目。^①論者先前多從宏觀層面敘述內遷進程中的重大事件,或聚焦政府官員、社會菁英群體的遷徙經歷,或將難民視為整體透析其流離失所中的生存困境及政府的因應之策。^②這雖勾勒出了內遷運動的大致輪廓,而菁英階層憑藉物質條件和社會地位留下的記錄,顯然難以反映底層難民的真實生存樣態。換言之,無數作為親歷者的普通難民,因未能留下任何文字記載,而不得不成為歷史敘事中的“失語者”。

戰時私人日記不僅記錄了書寫者自己的心路歷程,亦留存了特定時空下的社會相貌,是觸摸歷史肌理的珍貴載體。江蘇鎮江人周廉臣,1928年7月畢業於省立南京中學高中師範科,曾任教於丹陽、南京等地小學。1937年底,京滬地區相繼淪陷,31歲的周廉臣被迫於11月26日從南京踏上流亡苦旅。初期往返於南京與家鄉之間,12月1日則開始一路西遷,先後歷經南京至漢口、漢口至長沙、長沙至湘鄉蔣市街三段主要行程,其中南京至漢口段包括了返鄉經歷。^③

周廉臣的流亡日記以難民親身經歷者的視角,完整細緻地記錄了內遷的苦難歷程。日記中對出行方式、食宿情形、人際交往等生活細節的描寫,勾畫出普通難民顛沛流離的生活圖景;對故土的深切眷戀、對親人的無盡牽掛,以及對淪陷區民眾悲苦命運的記述,體現出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與內心掙扎。正是周氏兼具難民與知識分子的雙重身份,令這份流亡日記頗具價值,不僅呈現了普通

百姓在戰火下的生存遭際，亦揭示出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成為理解普通人內遷之旅的微觀記憶。基於此，本文從周廉臣遷徙經歷切入，求索內遷過程中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情感體驗與精神追尋。

一、流離路上的難民

淞滬會戰落幕之際，日軍分兵西進，直逼首都南京，戰局驟趨緊張。自 1937 年 11 月 12 日起，日機對蘇州展開輪番轟炸，“蘇嘉公路淒涼滿目，已成人間地獄”。^④11 月 20 日，國民政府發布遷都宣言，明確以四川重慶為戰時陪都，誓言與日本侵略者戰鬥到底。兩天後即有新聞媒體報導稱：“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長與所管機關，已經決定一律遷往內地，財政部長孔祥熙已於 19 日赴漢口……寧府要人之恐慌，頗形深刻”。^⑤22 日，時任行政院參事的陳克文亦在日記中載：“遷家逃難者，已去十之八九……黨政領袖，除蔣委員長外，悉已離京矣。”^⑥實際上，早在一周之前，行政院內“只聞苦力搬運之聲，職員多已不在”，而“路上行人亦多倉皇失色”。^⑦

政府機關大規模內遷，加劇了普通市民的恐慌，市內道路擠滿乘汽車、人力車、馬車、獨輪車及其他交通工具出逃的人群，成群結隊的難民紛紛湧向下關，“聽天由命地等待去漢口的機會”，而原本有限的交通資源又被特權者包攬。^⑧有報導稱，從 10 月初起，南京就已出現糧荒，物資極度匱乏，學校與各公共機關多陷入停擺狀態。^⑨

儘管前線敗報頻傳、學校經費拮据、教員相繼離職，周廉臣仍堅持授課至最後一刻。1937 年 11 月 26 日清晨 5 點，其在他人建議下收拾了行囊並東返鎮江老家，因“意志屈服了情感”。從理性上講，其意欲堅守南京，但出於對家人的牽掛與個人安危的憂慮，最終還是加入了內遷洪流。^⑩同期，陳克文亦登船離寧赴漢，其憑藉政府職員身份，乘坐的“外交部預定〔訂〕，英籍註冊”輪船“安全舒適無比”，且有獨立空間辦公休憩，免去了顛沛流離之苦；甲板上則擠滿難民，“一母攜幼兒女數人，臥二等艙甲板上，寒風中戰慄失瑟，哭泣呼號……”^⑪

相較於陳克文的內遷待遇，周廉臣的遷徙之路則充滿波折。當其離開南京之時，陸路交通已然癱瘓，輕裝步行四五里即“力不能支”。途中多次受阻，不僅雇車後遭遇空軍總站攔截，行至索墅鎮又聽聞“土橋散兵甚多，紀律極壞”。為躲避亂兵騷擾搶掠，數次繞道，雖抵句容之後證實此前傳言不實，當地“安謐如常”^⑫，但因謠言屢次繞道的行為並非戰時個體的偶然心理反應，而是有跡可循。潰散士兵與鄉間亂兵肆意侵擾民眾，儘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曾下令整飭軍紀，然此類禍民現象始終未能根絕，特別是官兵索款劫物滋擾民間的行徑給民眾帶來嚴重的心理創傷。^⑬在如此社會背景下，謠言和真相的邊界常系於個體生存焦慮的一念之間，蘊藏著不確定性的謠言往往更直接地關聯著民眾的生存危機，亦非常易於被人採信。

11 月 27 日中午，周廉臣在前陵村與表兄重逢，留下“晚餐吃煨雞，鮮味可口”且餐後“沐浴於蒸鍋上，極暢”的溫馨記憶。^⑭這些溫暖畫面成為流亡生涯中珍貴的精神慰藉。29 日，剛與家人團聚，便知好友泰榮兩日前曾赴南京欲約其西遷，不禁感慨“南轅北轍，鑄成大錯，悔之不迭”。與家人交談時，炮聲“如山崩地裂，屋為震撼，作聲諸人相顧失色”，半夜一家人又被炮聲驚醒，母親囑咐其與三弟“同向西逃亡”。次日晨，周廉臣含淚辭別家人，踏上流亡之路。^⑮返京途中，周目睹炮聲隆隆中有的農人仍在田間耕作如常，有的村民則因懼怕被拉夫而慌忙逃離田野避難；牽牛攜物的難民與寒冬裡穿著破爛單衣的國軍守衛交錯而行，共同呈現出生存困境下的不同狀態。周在恐慌憂慮中保持鎮靜，甚至與逃兵同吃茶點。而遠處京城宏偉的佈局與即將被日軍侵佔、河山變色、民眾流離的前景形成強烈對比。這段往返經歷，不僅讓周提前感受到流亡的艱辛，亦在內心深處留下家國已傷

痕累累的圖景。^⑩

12月1日,周廉臣回到南京之時,“經中華東門,僅有半扉可通行,並拉夫做工。市內交通除少數軍用汽車及少數軍用人力車外,別無所有。市民個個面帶愁色。沿城一帶各戶已滿駐軍隊,少數店鋪仍繼續營業,大有朝不保夕之慨。”^⑪夜幕下,周及其三弟在警報聲中踏上由南京西行蕪湖的列車,並遭遇“人眾不易擠上,軍民雜處”、“車蠕蠕動,速率極緩,車上亦無燈光,擠得一身臭汗”的困境。途中火車又停車兩小時,抵達蕪湖時已近午夜兩點,兄弟兩人僅以隨身攜帶的茶蛋充饑。因人生地不熟,“欲宿旅社遍不著,乃於車站待車處坐等天明,風寒刺骨”。次日晨,兩人購買油炸餅為食,隨後在洋碼頭尋找上水輪無果,又與好友泰榮和家人就生擦肩而過,亦未能在旅館尋得友人,周廉臣徹夜未眠,精神疲乏。^⑫逃難中,人們因交通阻滯、局勢動盪難以履行與親友的約定,求生本能驅使下的逃亡成為割裂親情與友情的枷鎖,而內心的思念與書信往來則成為流亡者彼此慰藉的精神紐帶,支撐其在顛沛流離中恪守希望。

12月19日,周廉臣歷經水輪換乘、車船停滯等重重困阻,終抵漢口。次日上午,前往賓陽門車站候車。因當日上午列車禁載軍人與難民,不得已改乘下午的難民車。候車間隙,周雇人力車至菱湖中學,向校工詢問友人炎孚通信地址,得知其已遷至江陵。隨即修書報平安,稱自己已“逃出虎口”。^⑬從白晝到傍晚,候車過程漫長而備受煎熬。下午4時,一列空車駛入車站,卻為傷兵專列,二人無法搭乘。但在月台上偶遇友人畢先生,短暫相聚,互訴別後境遇。然好友重逢並未緩解行程困頓,直至午夜一時半,三人才登上一輛無任何照明設施的列車,車廂內擁擠混亂:“在婦孺叫呼與人聲嘈雜中,致與三弟、畢先生失散,心中時刻不寧。當時一片混亂情形,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此次意外失散,使之產生嚴重情感焦慮,以至坐以待斃,天明至湖南臨湘境內,站立於凳子上望見三弟方覺心安。早晨“進餅點整口,食五茶蛋充饑及飲開水半杯”,又因隱忍一天,“大小便極感不便”,備嘗旅途困苦。21日下午5時,三人抵達長沙北站,隨畢先生至其家中進餐,後入市沐浴。次日,拜訪教育廳曹來賓獲還款5元,借此“購零星物件”。^⑭在長沙停留的三日裡,因寄宿於畢先生家,周在等候赴湘潭輪船時免去無處棲身之苦,可於碼頭問詢後返回畢府靜候。

12月23日,周廉臣在細雨中登上前往湘潭的客船。船內人滿為患,無立足之地,甚至無法如廁,只得終日相對而坐,“食預購之乾糧充饑”。當晚下船之後投宿旅店,因旅客複雜,“恐防意外,夜眠不熟”。次日晨,兩人雇人力車赴湘鄉,途中見軍用汽車“風馳電掣而過”,不禁感慨“人力與機器相去天壤”。抵達湘鄉之後,尋人打聽內遷之前友人周必鑠留下的井字街住址,幾經打聽未果,“焦急異常”。幸在一所學校偶遇周必鑠堂兄周伯渙,方知井字街即蔣字街,並獲前往線路。25日,啟程前往周必鑠家,步行10里之後即“足背筋肉酸痛”,遂“雇人力車一輛,與三弟二人同坐”,下午一時至虞塘鎮時“足已僵冷麻痛不堪”。^⑮短暫進食之後繼續前行,途中翻山越嶺,雖被山水景致觸動,卻因山間陰森心生恐懼,“一則怕歹徒搶劫,次則懼山處野狼”。其三弟常年勞作,體力強健,同行過程中分擔行李數十斤,感慨若非三弟“平時訓練有素,則寸步難行”。黃昏時分,兩人終抵蔣市街,經藥號與周伯渙處輾轉得知周必鑠家在獅坪,不得已繼續拖著疲憊身軀前往友人家裡。^⑯

在周家安居的一個多月,成為周廉臣流亡途中最安寧閒適的歲月。抵達周家當晚,面對東道主待如上賓的禮遇,他表示“萬里投靠,正有歸宿”。這種安穩的生活狀態使之從疲憊中恢復,實現“被褥齊整,夜睡舒適,疲勞全復”的身心調適。^⑰在此後的鄉居歲月,周過著“一日三餐,均食乾飯,無所事事,飽食無所用心,除致冬友書信與必兄下棋談天外,別無所事”的安逸生活。同時引發其不安情緒,希望能夠重新工作,以消解受恩於人的愧疚之感。其間,他雖自認為“到處均能安住”,

並將三弟“思家特甚”歸因於長期居家的生活模式，但這種自我剖析並不能遮掩內心深處的思鄉情結。事實上，無論是三弟的思鄉表現，還是其本人“家書絕音，家鄉僻壤，偶得省會報紙，如獲至寶”的感慨，均體現出內遷者對故土的深切眷戀。^②而“隨地可居”的能力，實則建立在戰前時局相對穩定的基礎上。日本全面侵華之前，他雖因工作漂泊在外，卻能保持與家鄉的緊密聯繫；而戰時的動盪使包括周廉臣在內的個體喪失了自主選擇的權利，被迫在顛沛流離中遙念故鄉，內地他鄉的寧靜生活反而加劇了其思鄉之情。

因三弟經周必鑠介紹至親戚處充任田夥勞作，周廉臣在周家安居期間除每日與鄉中老者談文論史外，唯以讀書、記日記為業。經與桂林友人書信往來，知悉當地或可謀得教職，便於 1938 年農曆新年之後的 2 月 1 日在周家燃放的爆竹聲中再度踏上內遷桂林的行程。三弟送行一程後即返回蔣市街安居，周廉臣獨自啟程。兄弟別離的悲傷思緒尚未消散，2 月 6 日抵達衡陽站時又遇大雨，幸投宿至一家鎮江旅舍。^③見到家鄉招牌頗感慰藉，稱其“飯菜極佳”，即便後來補記當天日記時仍“羨念不已”。^④而這一紀錄亦成為其現存日記的終篇。

從出行方式與生存狀態觀之，周廉臣的內遷充滿荊棘與不確定性。他或乘車，或登船，甚至徒步翻山越嶺；途中既需忍受車船內軍民混雜帶來的不安，又常因進入陌生村莊被當地村民視為異客而心生惶恐。食宿條件同樣窘迫，時而夜宿船艙，時而在車站苦候至天明，更因難民潮導致旅館爆滿不得不在街頭舊鐵棚車中和衣而眠；飲食亦無規律，偶遇友人資助便能飽餐，而身處陌生環境時則只能忍饑受凍。值得注意的是，日記顯示周廉臣在流亡途中頻尋舊友，通過索回借款、獲取資助等方式維繫生存。這種基於人際網絡的互助成為流亡旅程的重要保障，體現出教育界知識分子相較於普通貧苦民眾在生存資源獲取上的優勢。

而周廉臣與其三弟流亡至蔣市街之後做出的不同選擇，則體現出內遷難民返鄉現象的複雜性。難民返鄉雖與思鄉之情有關，但更多出於生計考慮。儘管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在各地廣設救助站以安置難民，內遷之路依舊充滿艱險。與大多漂泊不定、生命財產難有保障的普通難民相比，周憑藉教育界人脈獲得支持，遷移過程相對順利。然即便抵達後方，許多難民仍面臨生計無著、前途未卜的窘境。此時，收到淪陷區家鄉“如常安靜，沿途無阻，可覓便歸來”的消息，促使他們選擇返鄉，甚至產生“回鄉遠勝流亡”想法。^⑤赴渝民眾難以大規模就地疏散鄉間，反多被遣返至武漢，主因在於缺乏合適疏散點及難以解決生計問題。^⑥當局雖高度重視難民回籍問題，並在重慶、沙市等船隻出口處嚴加檢查，試圖引導難民返回後方，但在短期內無法解決生計的情況下，生存困境反而強化了他們的思鄉之情。^⑦陳達宇一家人內遷途中，既遭遇家鄉財產糾紛，又面臨流亡經濟壓力，但家庭事務始終縈繞於心。^⑧由此可見，難民返鄉原因錯綜複雜，生存需求始終是其決策的核心。周廉臣三弟在蔣市街重獲勞作機會，思鄉之情漸淡；而周廉臣在蔣市街“無所事事”，既難經濟獨立，亦難踐行教育者價值，故迫切希望赴桂林求職。他們的選擇與境遇，與無數流亡難民處境有著共通之處，反映出戰爭背景下個體生存的困境與無奈。

二、困頓中的教育者

與內遷途中的絕大多數難民相異，周廉臣是一位通過閱讀與思考，對職業發展和家國命運持續不斷追索的教育工作者。周氏畢業後，相繼在江蘇丹陽縣立師範實驗小學擔任過 4 年教導主任，在南京市小西湖小學執教兩年，有累計 6 年的基層教育經歷，構築起其教師職業發展的重要基礎。1930 年 12 月 18 日，丹陽縣立師範學校 80 餘名學生在 3 位教師帶領下前往鎮江省立實驗小學參

觀，以周彼時在當地教育界的執業經歷與人際網絡，此次活動或許與其存在一定程度的關聯。^③此外，在南京期間，其亦可能通過友人了解到劉百川有關《小學教育實際問題》的演講內容。^④小西湖小學的發展具有特殊的歷史脈絡。該校前身為普育堂資助且僅招收救濟院兒童的小學，1933年8月經南京市社會局提議更名小西湖小學，並將招生範圍擴展至曾在義塾小學或民眾學校肄業的學生。^⑤周在普育小學時期便已任教，親身經歷學校更名重組及招生標準轉變。1934年7月，通過南京市社會局資格檢定後，開始擔任市立高崗里簡易小學校長，直至1937年底因戰亂流亡離校，任職達三年有餘。^⑥南京保衛戰打響及其失守之後，學校在戰火中損毀嚴重，教職員工離散，周亦踏上流亡之路，教育事業則陷於停滯。^⑦

1938年2月25日，32歲的周廉臣流亡至桂林，面臨生計與擇業雙重困境。經舊友引薦，獲得前往廣西中山紀念學校工作的機會。因日機轟炸引發的倉促內遷，其畢業證書及過往工作證明未能妥善攜帶。面對廣西省教育廳履歷審查與資歷考核，周向南京市社會局桂林辦事處提交教師資格證明申請書及履歷書。最終，順利入職廣西中山紀念學校，擔任生活指導部辦事員，參與1937年度第二學期工作，入職時間早於新任校長李相勛（安徽桐城人、著名教育學家）。^⑧這一任職結果可能與當時申請流程的推進及其人際資源網絡等因素有關。

重獲教職後，周廉臣悄然隱去流亡者身份，重拾教育者的初心與信念，提筆撰寫教育改革方案，字裡行間飽含對時局的思索與愛國熱忱。他在日記中抄錄《蘆溝橋》一曲，悲憤之情與抗戰之志躍然紙上。其生死認知的蛻變，始於南京出逃之後的顛沛流離歷程。除短暫東歸返鄉外，一路西行的困頓、途中見聞的衝擊，以及親友離散的痛楚，使之對個體生死與民族命運產生新的省思。日本侵略者的屠戮暴行與敵機轟炸，使中國民眾時刻面臨“悲慘的死”。周痛斥此類死亡實為無價值之犧牲，視其為刀俎魚肉般的屈辱結局，於民族存亡無益。在國難深重之時，他將個人安危與民族存亡相連，認為“有代價的死才是生的門徑”，以凸顯反抗的意義。^⑨

西遷途中，周廉臣目睹亂兵劫掠行人的場景，侵略者炮火下的亂象對其內心造成強烈衝擊，激發深沉悲憤。基於自身逃難體驗與閱讀積累，他對曾國藩“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貧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的論斷產生共鳴。^⑩通過觀察，他發現日本侵略引致敗兵搶劫、散兵滋擾等現象嚴重威脅民眾生存根基，明確提出當局與軍隊長官須嚴令禁止士兵擾民的治理主張。同時，戰時官場腐敗與社會失序又使之不禁感慨：“今日我國居官居家者，多半有此現象，是亦可悲矣。”在其眼中，社會呈現多元矛盾圖景：“一方面奉行民國正朔，一方面準備廢曆過年；一方面壯烈犧牲，一方面依舊娛樂；一方面毀家紓難，一方面擁資自豪；一方面焦土抗戰，一方面大興土木；一方面妻離子散，一方面訂婚結婚；一方面風餐露宿，一方面養尊處優；一方面公用汽車缺乏，一方面市上空停多輛；一方面徒步向前方增援，一方面包車運家具避難；一方面吃素念佛，一方面勾心鬥角。”^⑪這些基於現實的觀察與反思，反映出時代變動中知識分子的認知嬗變軌跡。

走出書齋與校園的小學教師周廉臣，已然成為社會問題的思考者與教育者。他關注的問題上至國家戰略、官場秩序，下至社會生活、民情百態，這些矛盾現象構成複雜集合，在侵略與抗戰、“常”與“變”之間，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皆被捲入。名聲、地位與財富在當時甚至成為生存室礙，有錢人家逃難時雖有家資支撐，卻常常難免遭遇搶劫，乃至因之而殞命；貧苦百姓逃難時雖身無分文而衣食住行艱難，卻似乎反倒變成了一種避險優勢。陳達宇一家人逃難至東湖常遭強盜騷擾的村莊，房東見其落難，免費提供住所並借糧，條件是幫助守夜；因村民怕被搶劫，每夜皆攜財物躲避。正如

陳氏所言：“我們是個光桿兒，什麼也不怕，便落得答應他們。”^④這表明在劇烈變動的時代，財富與地位的差距常因特殊原因縮小甚至逆轉。

走出書齋並非意味著周廉臣可以臨陣殺敵，書生身份決定其只能重返課堂從事教育工作，然此時他已將抗戰教育思想融入教學，實現教學思想轉向，即“說教”與“做事”成為其行事與教學的雙重準則。他明確提出：“說是口頭說話，做是實行做事，說與做實是不可分割的，但有許許多多人，他偏只是口頭說，而不肯實行去做。”並斷言此類靜坐言說卻不實踐者，於社會於國家無益。救亡吶喊雖盛，若非人人落實救亡工作亦無意義。面對日軍深入中國腹地的局勢，他呼籲同胞“莫只說，快去做”。^⑤與周氏相類似，身處晉南鄉村的小學教師郝星久同樣對“學而不做”及“教而不做”等現象深刻反省，將其日記命名為《教學做日記》，指導教學實踐與社會活動。^⑥由此可見，對戰時社會現實問題的深入思索與改革訴求，構成以周廉臣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共同時代體驗。基於“做事”的態度，他對當時小學教育現狀深感憂慮，強烈呼籲教育轉型。

回顧1937年11月25日上完離京前的最後一課，繼而流亡武漢、湘鄉、桂林等地的經歷，周廉臣在重獲服務兒童教育工作機會之時，開始深刻思考過去國民教育失敗的根源。他敏銳地意識到，戰時全國總動員應涵蓋兒童群體。時論認為，在爭取民族解放的戰爭中，若要提取民族與個人的一切資源供給戰爭，必須廣泛深入地開展全國總動員，廣泛至窮鄉僻壤，深入到落後群體乃至每個人心底，如此戰爭勝利才更有把握。^⑦受到此類觀點影響，周在日記中強調國民政府的全國總動員應不分前方與後方，前方將士浴血奮戰，後方需積極開展宣傳、武裝與組織民眾、服務戰區、慰勞傷兵、撫慰流亡者等工作，刻不容緩。作為流亡者，他需教學維持生計；作為教育者，他主張後方國民教育須順應戰時環境改革，學生不能拘束於傳統的閉戶讀書、按時上課模式。

因抗戰持續時間難以預料，兒童作為未來抗戰的生力軍，其教育成效直接關係抗戰人才培養與輸送。據此，他提出抗戰時期兒童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則：其一，實施教教衛合一，將教育重心從學校課程轉向社會改造；其二，培養兒童耐勞吃苦、勤儉節約習慣，以及抗戰所需實用技能；其三，推進學校社會化，提升兒童自治能力，通過實踐實現生活社會化；其四，強化童子軍教育，要求高年級學生全員受訓。尤其在其擬定的改革計劃中，從學業、訓練、體格鍛煉、兒童自治、家庭聯絡、社會推廣六個維度明確了兒童教育的核心內容，凸顯“走出學校、超越課本，服務抗戰”的主旨。他強調，戰時兒童技藝學習須緊扣抗戰需求，將學校視為軍隊、教師作為指揮官，通過民族英雄事蹟薰陶，養成兒童強健體魄和豐富軍事技能；同時，注重培育兒童社會服務意識，使之成為抗日動員的積極宣傳者。^⑧為直觀地呈現戰時教育內容，他將報紙上有關抗戰的圖畫剪貼於日記中，圖畫下方配有“四六分租，主佃雙方快樂”、“加緊生產，收成超過幾倍”、“吃飽肚子，打仗節節勝利”、“打走鬼子，大眾安居樂業”等標語，這些內容既與他對兒童的培養期望高度契合，亦彰顯出其對戰時國人的普遍期待。^⑨此外，他還在日記中抄錄《中國童子軍誓詞及規律》的核心內容，致力於將學生培養成做事能力強、習慣良好、常識豐富、體魄健全，且兼具智、仁、勇品質的青年。^⑩

周廉臣的教育事業並非持續未斷。1938年春，他經友人舉薦再任教職，然其教育工作的具體時長已無明確記載。1943年7月印行的《資源委員會運務處職員錄》顯示，“周廉臣，字養之，三十七歲，江蘇鎮江人，1940年10月1日報到，為資源委員會總務處事務員。”^⑪這一記載清晰呈現了其職業軌跡的重要轉折。其離開教育領域的原因，或在於因戰時生計所迫而放棄學校工作，或在於隨機構內遷獲資源委員會職員一職。無論何種情形，可以確定的是，他始終以知識分子的自覺承擔時代責任，將愛國信念融入資源委員會的工作日常，在戰時經濟建設與後勤保障中踐行日記中強調的

抗戰救國理念。其經歷不僅反映出戰時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更凸顯了個體選擇與國家命運的深度鏈接。周廉臣在維持生計的前提下，通過職業角色的身份轉換，將救國理想變為多元行動，成為全面抗戰時期知識階層精神世界的生動縮影。進一步說，普通人的抗戰正是在生存考量與愛國情懷之間不斷平衡的結果。

三、淚眼中的家國

作為流亡途中的內遷難民與兼具家國思量的知識分子，周廉臣目之所及，盡是山河破碎、生靈塗炭。其逃難經歷中深沉的家國之思，彰顯出知識分子“忍不住的關懷”。^④這種對國家的熱愛與時局的憂慮，集中體現於札記書寫中。他將摘錄的日軍暴行報導命名為《倭寇獸行錄之臥薪嚐膽恥復此仇》，題名既深含對侵略者的痛恨，亦寄託著國人奮發圖強、重建山河的強烈願景。^⑤早在離寧之前，他便關注法國傳教士饒家駒（Robert Jacquinet de Besange，曾任華洋義賑會會長）赴松江視察的報導，並形成深刻認知。原報導稱，在滬從事救濟事業的饒家駒抵達松江後，發現全城已成瓦礫場，日軍駐兩師團，華人幾被殺戮殆盡，沿途僅見 5 人且形容枯槁。^⑥周廉臣由此感慨上海至南京之間昔日人口稠密的區域已成焦土，視松江的淒涼景象為該區域戰時情形的典型寫照。彼時尚未流亡的他，在授課之餘仍憂心京滬間大量人口的遷徙去向，而報導中上海至松江“目光所及，田野不能見一物”的荒涼景象更令其痛心不已。^⑦

札記系統記錄了多則日軍暴行。在松江，日軍“皆滿攜由鄉間獲得之劫掠品，並有洋車若干，裝載箱囊物品，跟隨於軍馬隊後，其狀極為奇特。騎於驢車甚至水牛背上之日兵奔馳於田野者，隨處可見。日軍之炮架上則縛小豬多口，至於鄉間之雞及野禽，亦皆為日軍搶去”。^⑧在盱眙、來安一帶，日軍殘殺無辜民眾千餘人，盱眙城內兩千家居民經浩劫餘 200 家，損失達 200 萬元。英國駐滬記者電稱，自日軍佔據京滬一帶後，華人被殺者 30 萬人。該電文遭日方檢查所扣留。從蘇州逃出的商人證實，日軍將無法逃離的老幼婦女五六十名集中囚禁，每日由其司令部發入內券 600 張供輪流逞慾，並以每日兩百輛載重車將劫掠品運往上海，總價值達五六千萬元。^⑨此外，留日僑胞亦遭殘害，僑務委員會委員楊壽彭（廣東香山人，曾任中國同盟會副會長、中國國民黨駐神戶直屬支部執行委員等職）於 1937 年 9 月 15 日被神戶憲兵拘押，同被囚禁的僑胞 34 名受盡折磨，楊則最終死於獄中。^⑩這些暴行如尖刀般刺入周廉臣的心，令他悲憤交加，深感“國將不國，家園不在”。私人日記中的系統記錄，既是對民族傷痕的文本留存，亦是愛國精神的直觀映射。這些札記用文字定格了日軍的侵略罪行，深刻展現了知識分子在烽火歲月中的家國情懷。

周廉臣的流亡之路伴隨著秩序崩解之時的眾生相，個體行為空間被極度壓縮。其自南京返鄉途中，見千餘川軍調防西移，“狀極狼狽可憐，隆冬天氣，甚至有僅著軍短褲者”。由家返京時，又因軍隊強徵壯丁屢受驚擾，不僅目睹村民四處逃亡，自身亦加入避丁隊伍。途中所見駐軍形容憔悴，“均著單衣褲，望之慘然”，向守城軍士韓某討水時，對方稱“縣府遷走，縣局與保安隊無形解散，余一二日即擬逃走，汝輩先行，余即步後塵”。後又遇逃兵王某形跡可疑，“解開包袱，內裡均係綢緞衣料”，周推測財物係沿途劫奪所得，由此發出感慨：“如此軍人何止千萬，吾民浩劫先受國軍糟擾，再受敵寇蹂躪，如此貪生怕死、利慾薰心之軍人焉能以之抗敵哉，其必敗無疑也。”因對王某心存忌憚，周廉臣“夜不成寐”，盡顯流亡者的生存焦慮。^⑪在蕪湖候船期間，他與同行者以 53 元高價乘坐軍用民船，押船下士班長雖“為人直爽”，卻在中途換船時再度索費，周指斥其借“國難時期實行敲詐”。^⑫儘管不滿敲詐行為，但軍人押送的船隻可以規避散兵劫匪。陳達宇對此深有體會：“在蕪湖

的兩岸，聚集著許多打垮了的散兵，等著封船後退，可是因為戰火的逼近，船隻早已躲避一空，他們弄急了，便在江面上亂封船。”^⑤周雖憑藉謹慎避開了行船時的侵擾，但在湖北黃石港候船時遭遇傷兵滋事，只能隨下水輪暫避；在漢口賓陽門車站又遭小軍官搜身，因無財物方得走脫；長沙尋船時，船長因“恐軍隊封差”、“恐難民眾多與傷兵滋事”而變更開船時間地點。^⑥1937年11月21日抵達長沙，他觀察到傷兵難民聚集都市，建議政府收容疏散，部分滋事者經懲處後收斂。在衡陽車站，則慶倖乘軍人車廂“不甚擠，亦不查票”，但目睹孩童為避兵役渾身淋濕的慘狀，又心生憐惜之情。^⑦周氏一路與傷兵、亂兵遭遇，構成戰時個體對社會變動的直接體驗。在戰爭邏輯下，普通百姓的生存弱勢被極端放大，生死安危往往系於瞬間。

周廉臣的內遷之旅，亦交織著時空錯位中的複雜心緒與價值判斷。在內遷之前由家返京途中，已萌生家國之痛。途經東山時，目睹“建築偉大而奇異，行將見棄於敵手”的蒼涼景象，遙望京都，雖見“氣象壯偉，形勢天然”，卻對日軍入侵威脅保持警惕；行至雨花台，又因防禦工事太過遲緩憂心如焚；抵達南京校內後更悲嘆“心血結晶佈置付之一毀”。^⑧這些觀察為其後續流亡經歷埋下情感伏筆，而在漫長的流亡歷程中始終心繫漸行漸遠的故鄉與往昔工作地域。1937年11月27日，日機在鎮江丹陽一帶實施轟炸，投彈逾百枚，造成重大人員傷亡與房屋損毀，此時周正自南京返回家鄉途中。^⑨12月27日，歷經艱辛抵達蔣市街周家後，通過報紙獲悉鎮江已於同月8日淪陷，當日其正於湖北武穴水域隨舟漂泊。^⑩報端所載“敵軍侵入鎮江時……該地房屋被毀殆盡，斷壁殘垣，滿目荒涼。該地民眾除有一部分入山匿避外，其餘均被殘殺，屍首狼藉，血流成渠”的內容，令其讀罷“痛泣在胸，熱血沸騰，非復斯仇誓不休也”。^⑪當知悉日軍佔領南京39天之後“仍有許多地方大火尚在焚燒中，恐怖之時期仍未度過”，且所有商業區均已淪為廢墟等慘狀時，身處異鄉的周廉臣不禁發出“回首燕雲，東望京滬，不免有故國悲感”的感嘆。^⑫1937年12月的流亡行程中，周廉臣情感劇烈波動。6日抵達彭澤馬當鎮時，目睹工人日夜趕築封鎖工程，其將國防建設的緊迫與舟行逆風的困境類比，以“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喻指抗戰形勢。然5天之後於湖口得悉日軍侵入南京光華門、通濟門並佔領空軍總站，遂哀嘆“料大勢已去，南京恐將不保矣”。又聞南昌空襲噩耗，其在流亡途中持續承受戰事惡化的精神衝擊，乃痛心疾首道：“目睹我錦繡河山行將被倭寇鐵騎橫逞，可慨也！”此後在赴漢口途中，武昌鄉師宣傳隊的愛國歌聲激發周廉臣愛國熱情，但偶遇逃出的南京站某報務員，兩人同病相憐，談及南京淪陷慘狀則“長敘許久”。^⑬這些即時性的情感體驗，生動地再現了個體命運與民族危亡的緊密關聯。

自漢口沿粵漢路至長沙途中，周廉臣對內地社會的觀察蘊含著對家鄉的思念與戰爭的思考。鄉村社會呈現出“居民多獨居成村落，造屋材料均用土磚，瓦房與竹房各半。居民生活極苦，多營小本業，在車站兜售”的貧困圖景；長沙、武漢等都市則延續著“奢侈享樂，崇尚摩登，好逸惡勞”的消費文化，遂發出“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慨嘆。同時，異鄉與故鄉在語言、貨幣等生活細節上的異同，如“言語普遍均能聽懂，生活程度較京都稍低，習慣人情，與蘇地大同小異”，“語音多開口呼，與蘇地略別”，“蘇幣市面不用，通用以湘省銀行紙幣及中央法幣為準”，又不斷觸發對淪陷家鄉的深切思念，凸顯流亡者身份認同的矛盾與掙扎。^⑭在湘潭途中，周廉臣對市井經濟的觀察進一步深化了其對戰時社會的理解。他既目睹因人口遷徙帶來的商業繁榮，又發現小商販“互嫉營業，競價出售，每角十六包”的生存困境，由此得出“社會不景氣之現象可見一斑，均為生計所迫”的理性判斷。^⑮

即便在友人家裡短暫安居，周廉臣的流亡者身份意識依然十分強烈。他看到街道小學蓬勃向

上的精神面貌，既心生欣慰又因無法繼續從事教育工作而倍感悲涼。友人家豐衣足食的生活場景強化了其對家鄉親人的思念與擔憂，異鄉人的漂泊感與對故土的眷戀之情交織於心。帶著深沉的家國之痛，周廉臣最終踏上內遷桂林的旅程。從現存日記可見，周始終以文字為載體，持續記錄流亡者的生存實態，表達對家國命運的深刻思索。

四、結語

日本侵華，國土淪喪、家園毀於戰火，周廉臣為謀生存踏上內遷之路。遷徙途中，他既因亂兵劫掠而憤懣，又不得不借助軍隊押送的車船以求平安；目睹異鄉百姓生活安寧，甚至親歷湘鄉友人闔家團圓，卻難掩自身與家人離散、故土淪陷的悲愴。現實境遇與內心情緒的強烈反差，使之即便寄情他鄉山水、感受友人溫暖，精神世界仍飽受煎熬。與定居湘鄉蔣市街、回歸田園勞作的三弟相比，作為保持閱讀習慣的知識分子，周廉臣所見山河破碎之景、所念民眾苦難之情，持續加劇其作為流亡者的身份焦慮。從湘鄉經桂林至重慶的輾轉歷程，雖結束了地理空間上的流亡，但思家愛國之情與面對現實的無力感相互交織，精神始終處於流亡狀態，且隨著對家國命運的憂慮與現實困境的無奈加深，這種漂泊感愈發強烈，深刻影響著精神世界與生存體驗，折射出當時知識分子普遍面臨的精神困境。

內遷難民群體龐大，逃難經歷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珍貴記憶。周廉臣作為戰時內遷難民群體中的親歷者，既經歷了難民群體共有的艱難困苦，亦具備知識分子的特殊性。他既無政府官員的優渥內遷條件，亦不具備菁英階層免於長途奔波的經濟實力，但教師職業積累的盤纏路費和人際網絡使之境遇又不同於廣大底層難民。他無需如眾多難民般忍饑挨餓、沿街乞討，甚或賣兒鬻女以維持生計。其三弟雖無穩定職業與廣泛社會關係，卻憑藉家庭血緣紐帶，在與兄長一同內遷後共享社會網絡帶來的效益，從而擺脫了普通難民在饑餓線上掙扎的命運。從這一角度而言，他無疑是幸運的。

周廉臣流亡日記的珍貴之處在於，它不僅記錄了自身與底層難民相比條件稍好的逃難體驗，更描繪了那些生活無以為繼的難民群像。作為親歷者，他對這些群體懷有共同的時代體驗和深摯同情。而教師職業帶來的有限內遷資源，既未能減輕遷徙中的身心勞頓，亦平添了些許知識人的憂思緊張。正是通過諸如周廉臣之類的普通知識分子的記憶留存，後人才得以讓“失語者”發聲。普通民眾在戰爭摧毀家園後的生存抉擇，是國家和民族面對外敵入侵時不屈精神在個體層面的生動展演。儘管多數內遷民眾未能留下任何文字記載，但通過類似周廉臣的個體日記等史料，我們得以窺見戰時民眾為生存拼搏的身影。這些看似平凡的個體經歷，實則是民族精神的微觀縮影，他們的血淚與哭喊及為生存努力遷徙的行動，彙聚成照亮黑暗歲月的星火，共同書寫了中華民族在危難中永不屈服的篇章。

①參見蘇智良等編著：《去大後方——中國抗戰內遷實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如葛振凡、何金華：《兩難的困境：抗戰時期的難民回流問題（1938—1940）》，南京：《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3年第2期；程朝雲：《抗戰初期的難民內遷》，北京：《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2期；王春

英、吳會蓉：《抗戰時期難民遷徙與“內遷文化”的形成》，成都：《西華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孫彥魁：《抗戰時期難民群體初探》，南京：《民國檔案》，1991年第2期，等等。

③《周廉臣流亡日記與札記》（1938年1月至2月），南京市檔案館編：《南京市檔案館藏抗戰家書及流亡

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

④達文：《蘇州淪陷記》（1937年11月27日），香港：《戰地通信》，1937年第8期。

⑤《因日軍之突破蘇州，南京恐慌，各部院將一律遁入腹地，寧方似仍圖死守南京說》，馬來亞檳城：《現代日報》，1937年11月22日。

⑥⑦⑪陳方正編輯、校訂：《陳克文日記（1937—1952）》上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32頁；第128頁；第134頁。

⑧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屠殺史料集（59）：〈東京朝日新聞〉與〈讀賣新聞〉報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7頁。

⑨《南京糧荒物資亦極缺乏，各學校及公共機關率多停止工作》，北平：《世界日報》，1937年10月4日。

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南京市檔案館編：《南京市檔案館藏抗戰家書及流亡日記》，第232頁；第232頁；第233頁；第234頁；第234~237頁；第237頁；第238頁；第245頁；第246頁；第248~249頁；第249~250頁；第250~251頁；第251頁；第252頁；第253頁；第270頁；第259~260頁；第267頁；第259~267頁；第268頁；第263頁；第254頁；第255頁；第255頁；第255~258頁；第257頁；第236頁；第241頁；第246頁；第253頁；第237頁；第255~256頁；第257~258頁；第240~243頁；第247頁；第248頁。

⑬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5冊，台北，2014年，第573頁。

⑳《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關於難胞回籍資敵的三點建議致社會部之公函》（1940年4月24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社會部檔案，卷宗號一一（2）—3699。

㉑《中央社會部職員鄒壽昌關於如何解決來渝義民生計以杜絕潛返武漢之風的提呈》（1940年4月2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社會部檔案，卷宗號一一（2）—3699。

㉒《賑濟委員會為在渝義民生計一事致中央執行委員會社會部之覆函》（1940年5月3日），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社會部檔案，卷宗號一一（2）—3699。

㉓㉔㉕陳達宇：《八年流離》，南京市檔案館編：《南京市檔案館藏抗戰家書及流亡日記》，第204頁；第213頁；第208頁。

㉖《丹陽縣師來鎮參觀》，鎮江：《新江蘇報》，1930年12月18日。

㉗朱佐廷筆述：《小學教育實際問題：劉百川先生在丹陽縣中小學成績展覽會講》（1933年10月），鎮江：《江蘇教育通訊》，1933年第1卷第4期。

㉘《普育小學改稱小西湖小學案》（1933年9月8日），南京市政府秘書處：《南京市政府公報》，第132期（1933年）；《普育小學改名小西湖小學，變更入學資格》，南京：《南京晚報》，1933年8月11日。

㉙《南京市市立簡易小學一覽表》，南京：《新南京》，南京市政府秘書處，1935年。

㉚《廣西中山紀念學校概況》，出版地不詳，1938年，第19頁；《廣西中山紀念學校校長李相勛就職》，南寧：《南寧民國日報》，1938年3月17日。

㉛岳謙厚、侯采坪整理：《一個鄉村知識分子的抗戰記憶——郝星久日記》，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4頁。

㉜凌青編著：《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和戰術》，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38年，第1頁。

㉝《中國童子軍誓詞及規律》（1933年9月28日），廣州：《廣東教育月刊》，1933年第2卷第12期。

㉞《資源委員會運務處職員錄》（1943年7月），出版地不詳，1943年，第7頁。

㉟具體論述參見楊奎松：《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廣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㊱《饒神甫談松江劫後慘狀》，《中央通信社稿》，1937年11月下卷，第394頁。

㊲《敵機轟炸鎮江丹陽》，《中央通信社稿》，1937年11月下卷，第321頁。

㊳《一週大事日記》（1937年12月8日—12月14日），上海：《國聞週報》，1937年第14卷第49期。

作者簡介：岳謙厚，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院教授。南京 210023

[責任編輯 陳志雄]